

论公平、民主、正义的非法性

张皓翔

ORCID: 0009-0001-2997-7726

书稿阅读下载链接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1130668> (始终指向最新版本)



论公平 民主 正义的非法性

作者简介：

姓名 :张皓翔

邮箱 : 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ORCID: 0009-0001-2997-7726

目录

第一章：公平、民主、正义的非法性叙事.....	3
第二章：解放从肯定性叙事到否定性叙事的倒置.....	5
第三章：关于两种民主的双重扬弃.....	8
第四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红线——解放.....	12

第一章：公平、民主、正义的非法性叙事

在人类千百年的社会发展史中，公平与正义似乎构成了最美好、最终极的人文追求。为了使这一追求不至于落入纯粹的乌托邦幻想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为其披上了不同的制度外衣：封建社会诞生了以缓和阶级矛盾为目的的“民本”思想，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则发展出了被奉为圭臬的“民主”制度。于是乎，公平、民主和正义的道德要素，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衡量近代乃至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甚至被塑造成了人类历史演进的终极目的。

当我们审视千百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时，会发现一个极其吊诡的历史现象：不论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还是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被统治阶级，似乎都不遗余力地在高呼着公平、正义与民主。但这里隐藏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其终极追求竟然是同样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依然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

有人会立刻反驳说，那是因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口中所说的“公平、正义与民主”，在实质上根本不是一套东西。这样的解释当然是对的，它精准地指出了两者在物质利益和阶级诉求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他仍然没有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对存在根本性差异甚至完全对抗的阶级追求，却在日常的政治叙事中，心甘情愿地共享着同一套话语外衣呢？

这正是统治阶级长期以来所精心谋划并竭力追求的意识形态结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统治阶级通过对公平、正义与民主等抽象概念的极力宣扬与美化，将其自身特殊的阶级利益，伪装成了全人类普遍的共同利益。在这种宏大叙事的笼罩下，被统治阶级在没有经过正确的、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时，会陷入一种自发性的思想迷茫：他们会本能地认为，对这些概念的追求便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追求这种被统治阶级定义的“美好”，便是等同于追求自己的真实需求。

于是，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蒙蔽与统摄之下，被统治阶级的根本诉求似乎被奇迹般地“软化”了，它似乎可以与统治阶级的发展逻辑进行和解。他们在虚幻的观念世界里达成了一种“共同的追求”——即公平、民主与正义。

然而，一旦我们剥开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就必须冷酷地追问：公平、民主与正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中，它的本质绝不是什么先验的道德律令，而是统治阶级在面对于其阶级社会中无法根除的、无法处理的压迫、剥削与特权等结构性问题之后，所必然滋生出的一种“相反性叙事”（Inverse Narrative）。

这种相反性叙事的本质，并不是在描绘一种真正可供全人类追求的未来。它的实质，是对阶级社会中那些根本不可解决的痼疾（如私有制带来的必然剥削），提供一个相反的虚幻镜像。当现实中的经济剥削越是残酷，法权层面上的“公平交易”就越是高唱；当现实中的阶级压迫越是深重，政治层面上的“民主权利”就越是粉饰。这种相反性叙事的功能，在于制造一种错觉——让我们误以为只要不断完善这些概念，就可以追求到更加美好的发展，从而掩盖了系统本身就是制造苦难的根源这一事实。

因此，我们要树立一种极具颠覆性但却无比清醒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必须，也应该承认压迫、剥削、特权与非正义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指的是

它们作为阶级社会物质基础的客观实在性。因为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是私有制生产关系下必然的产物，是血淋淋的现实，正因其真实与客观，它们才是无产阶级需要去彻底摧毁、暴力革除的实体对象。

与之相对的，我们坚决否认公平、民主与正义的合法性！因为它们仅仅是统治阶级为掩盖自身无法处理的结构性危机，而刻意滋生出来的一种道德性的虚假命题。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痛斥“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时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概念是用“承认”代替了“消灭”，用“局部的改良发展”代替了“彻底的根除”【2】。它们的存在，如同麻醉剂一般，不仅掩盖了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真相，更致命的是，它掩盖并替换了被统治阶级真正应该追求的根本性需求——即解放（Liberation）。

同时，马克思对这种道德化叙事的彻底否定，绝非一种偶然的义愤或简单的拒绝，而是扎根于他对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自觉。在《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毕生都在与一种极具迷惑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即将道德与法权置于政治经济学之上，并使其扮演更为根基性的角色【3】。之所以必须极力批判这种倾向，是因为道德与法一旦被拔高为评判社会历史的最高尺度，它们就立刻化身为一套“绝不可能的美景”——一幅由统治阶级描绘、却标榜为全体人类终极理想的美景。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以对蒲鲁东的毁灭性批判，将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展露无遗【3】。蒲鲁东主义者幻想依靠一种“永恒公平”与“构成价值”来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他们将平等上升为先天的、神秘的目的，以为一切经济关系都本该为了平等的利益而发明，只是后来不幸地背离了它。对此，马克思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他认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背离了平等。”这种以道德应然去强行裁定现实经济的做法，彻底颠倒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原理：不是观念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于是，马克思在书中给出了那个标志性的论断：“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这就从根本上褫夺了公平、正义、民主作为永恒真理的法权外衣。它们非但不是衡量社会的最高圭臬，反而不过是特定生产关系在观念领域投下的神圣幻影。将这种幻影凌驾于政治经济学之上，无异于命令一个垂死的病人按照他自己高烧时的谵妄来描摹药方。正因如此，政治经济学才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彻底性：它拒绝讨论一切虚幻的美景，只追问价值的源泉来自谁，又应作用于谁。在《资本论》那著名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一节中，马克思以嘲弄的口吻描绘了劳动力买卖的流通领域——“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4】自由签约、等价交换、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再加上一副功利主义的精打细算，这难道不正是公平正义叙事所允诺的最完整的图景吗？可一旦我们跟随马克思的脚步踏出这个流通领域，剧中人的面具便被猛然撕下：“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那被高歌的公平，恰恰是剥削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那被圣化的民主权利，恰恰是阶级统治得以合法化的程序。这绝妙的讽刺，正是相反性叙事的完美具象。

因此，马克思之所以断然拒绝从道德层面、从正义和公平的角度去讨论解放事业，绝不是因为他要虚无主义地否定人类对美好的向往与追求，而是因为他深刻地看穿了：这种“美好”本身，正是统治阶级在无法处理其结构性危机时，精心炮制出的一种反动叙事。倘若无产阶级不假思索地接过这套话语，将“公平”、“正义”、“民主”树为批判的武器和斗争的旗帜，那么，他们在一开始便已经跌入了敌人预设的陷阱——因为批判的出发点，竟然是对反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变相承认。要求更公平的工资，便等于承认了雇佣劳动的天然正当；要求更正义的分配，便等于承认了私有财产权的不可置疑；要求更民主的权利，便等于承认了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永恒合理。这绝非战斗，而是一种隐蔽的投降，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不去挣断锁链，反而恳求宙斯把锁链锻打得更为舒适精良。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曾同样精准地指出，那种将平等、正义视为永恒真理并用以剪裁历史的行为，不过是在“用头立地”的意识形态操演。一旦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被困在这些道德范畴的泥淖中，革命便从推翻现存一切关系的断裂性行动，退化成了在现存框架内乞求施舍的改良主义把戏。

唯有政治经济学，敢于将这些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全部撕毁，直接提出那个血淋淋的追问：价值既然来自劳动，为何它却以资本的形式与劳动者相对立，并反过来支配和压榨劳动者？当这个问题被斩钉截铁地提出时，公平、民主、正义的叙事便立刻暴露出它们的全部非法性——它们不过是用“承认”代替“消灭”的另一种隐秘表达。也因此，我们不是在公平正义的旗下寻求改良，而是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基上，为彻底砸碎私有制牢笼的“解放”扫清思想上的第一重障碍。

因此，我们在本书开篇即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主、公平和正义的非法性叙事，绝非是因为我们要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否认人类对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我们之所以要将其彻底褫夺，是因为我们看清了这种所谓的“美好”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精心编制出的、带有强烈反动性质的谎言。

统治阶级正是通过这一套虚假的道德与法权叙事，完成了对真正具有颠覆性的“解放叙事”的全面遮掩。他们试图将无产阶级引向一条死路：使得被统治阶级误认为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改良”就可以达成目的；误认为只要争取到更多的“公平”和“民主”，统治阶级就是可以与之妥协、甚至值得依靠的。而只要这种幻象存在一天，私有制的牢笼就依然坚不可摧。我们要做的，绝不是去争夺如何在这个牢笼里更“公平”地分配口粮，而是要彻底揭露这种叙事的非法性，从而为砸碎牢笼的“解放”扫清思想上的第一重障碍。

第二章：解放从肯定性叙事到否定性叙事的倒置【这里我们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类解放，而非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解放】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被统治阶级千百年来真正追求的东西，从不是什么公平、民主与正义，他们真正追求的是那些被“统治阶级”用谎言所遮蔽的真相，即解放。然而，当我们试图在历史的地表上还原这一本源追求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横亘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的巨大认知鸿沟：解放，这一最具建设性与生命力的历史运动，在今人的意识形态直觉中，却往往呈现为一种彻底的否定性叙事。

但解放这一追求却常常带有着一种破坏性与粉碎性的冲击感，以至于解放往往

被解读为一种否定性叙事。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画卷里，一提到“解放”，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对旧秩序的暴力砸碎、对既得利益的无情剥夺、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以及社会结构的剧烈震荡。它仿佛天然地意味着对秩序的虚无主义拒绝，一种只管砸碎、不问重建的纯粹“破坏”。这种认知偏见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革命与解放本身成了动荡与灾难的代名词。

但这恰恰是我们在展开全面批判前，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予以清算与纠正的第一重历史错觉。我们必须尖锐地追问：为什么这场旨在让人类回归自身类本质、确立主体性地位的绝对创造，会在历史的叙事镜面中，被折射为一副狰狞而空洞的“否定”面孔？

首先我们要树立的第一个唯物主义常识是：解放的本质是发展。

解放绝非一种游离于物质生产之外的、纯粹观念性的暴动，而是生产力在挣脱腐朽生产关系束缚时的自我确证；它绝非要将人类社会拖入虚无的无政府废墟，而是劳动者不断夺回自身自主权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活劳动被异化为死资本，生产资料作为一种客观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压榨劳动者。因此，解放的物质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者重新夺回对自身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重塑生产资料与劳动主体的有机结合。这难道是一种“否定”吗？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肯定”——是对劳动作为人类生命第一需要和创造性源泉的绝对肯定。

在辩证法的维度上，解放的这一展开过程，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

辩证的否定（Dialectical Negation）绝对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机械否定，后者是简单的“一笔勾销”或“彻底灭绝”，而前者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意义上的“扬弃”（Aufhebung）。辩证否定的公式从来不是简单的“A 到非 A”（即以无秩序取代秩序），而是不断对旧事物否定，对新事物肯定的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曾以极具震撼力的辩证笔触描绘了这一过程。他指出，对私有制的否定并不是要消灭文明的成果：“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这个时代奠定的地基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权。”【5】

也就是说，解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其实质是对协作、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肯定”。它是对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既得生产力成果的保留，是对劳动者自由联合体这一全新生产关系的建构。它通过砸碎异化劳动的“外壳”（否定），释放出人类创造力的“内核”（肯定）。

因此，不断对旧事物否定，对新事物肯定的过程，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其终极的指向，是人类主体性的彻底确立与社会关系的根本重塑。在这个意义上，解放的本质应该是，也必须是一种肯定性叙事。它是对生机勃勃的历史创造力的确证，是对人类真正开始书写自身历史的积极宣告。

既然解放的实质是如此彻底的肯定性建构，那么，为什么在传统的、日常的历史叙事中，它却不可避免地呈现为一种破坏性、粉碎性的否定性面貌？

这首先源于解放运动在突破旧体制时所不得不展现出的“暴力之踵”。

马克思那句名言至今依然振聋发聩：“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当旧的、反动的生产关系已经退化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锁链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特权，必然会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和暴力工具进行垂死挣扎。在这场不可调和的阶级决战中，无产阶级要夺回对劳动力的自主掌控，就必须以排山倒海的断裂性力量，强行中断旧的法权秩序。

这种在特定历史节点上所释放出的、雷霆万钧的破坏力，给身处旧秩序温床中

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感官和心理冲击。私有财产权的废除、国家机器的砸碎、法权关系的重组，这一切对旧秩序而言，都无异于“世界末日”。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破坏在感官上的冲击力，他们故意将解放运动在特定阶段所使用的暴力手段（手段往往带有否定性外观），等同于解放运动的最终目的，从而将解放的丰富肉身，窄化为一具只有暴烈行为的骷髅。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在旧社会的子宫里，新社会的生产关系是无法“和平生长”的。

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局部的经济形态自发萌芽并壮大；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旨在消灭剥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却绝不可能在资本的统治下自发形成。它无法在现存的私有制框架内找到任何立足之地，它要求的是对整个雇佣劳动制度的彻底废除。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必须首先表现为对现存政治统治的夺取，表现为对资本逻辑的悍然打断。

这种独特的、必须通过“打断”和“破除”才能开辟道路的历史逻辑，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视觉偏差：仿佛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说不”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只有在砸碎枷锁的时候才是可见的。这一特征，极易被那些站在改良主义立场上的旁观者、以及深陷旧话语体系的知识分子所曲解。他们只看到了锁链被炸毁时产生的飞沙走石，却对挣脱锁链后劳动者走上的无限广阔的建构之路视而不见。

然而，单纯的感官偏差和历史特征，还不足以完成如此彻底的话语颠倒。

但为何在传统的叙事中会出现这一倒置呢？这本质便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巧妙手段，通过对公平、民主与正义这些谎言的渲染与美化，将它们肯定为一种肯定性叙事。从而系统性地否定解放的建设性作用，而只强调解放的破坏性，进而将解放污名化为一种否定性叙事。

这是一场极其隐蔽、极其恶劣，却在历史中反复上演的意识形态合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机器，通过一套精密的话语技术，将“肯定”与“否定”的标牌进行了彻底的置换。

首先，他们将本是虚无缥缈的谎言，这些非法性的承诺，强行塑造成唯一的“肯定性建构”。

统治阶级将他们豢养的“公平、民主、正义”推上神坛，用华丽的法权辞藻、精密的议会程序和温情的道德教化，将其包装成人类社会唯一具有“建设性”、“肯定性”的宏大蓝图。他们对这些概念进行无节制的渲染与美化：在他们的叙事里，一张选票的投出就是“民主的建构”，一次法庭的判决就是“正义的彰显”，一次资本契约的达成就是“公平的实现”。这套说辞极力暗示群众：现存的体制虽然有瑕疵，但它是一座正在不断添砖加瓦的、具有肯定性价值的“文明大厦”。任何人只要留在大厦内参与修补，他就是在从事具有“建设性”的崇高工作。

其次，他们系统性地阉割了解放的建设性、肯定性内核，只留下其手段上的破坏性外观。

统治阶级极其恐惧解放叙事对底层群众的唤醒。为了阻断无产阶级的觉醒，他们将解放运动一律贴上“否定性”的黑色标签。在他们的媒体、教科书和学术论著中，解放不再是劳动者重夺自身能动性的创造，而被污名化为对文明秩序的野蛮践踏，被描绘为一种只知毁灭、毫无建构能力的暴民狂热。他们承认解放的革新性，但否认解放的建设性。

在这种双重操作下，一种致命的认知陷阱被建立起来：

“改良”成了肯定性的代名词。哪怕这种改良只是在牢笼里调整栏杆的间距，

哪怕它根本无法动摇剥削的根基，它也被冠以“理性、建设性、肯定性”的赞歌。“革命与解放”则成了否定性的代名词。哪怕它是要彻底炸毁牢笼、释放人类全部生产潜力，它也被污名化为“激进、破坏性、否定性”的灾难。

这种倒置的实质，是统治阶级用一种法权上的、观念上的虚假“肯定”（实际上是对剥削制度的承认），掩盖并替换了无产阶级在历史地表上最真实的物质“肯定”（即解放）。他们迫使被统治阶级相信：任何试图从根本上跳出“公平-不公平”、“民主-不民主”这一预设框架的尝试，都是在走向虚无和混乱。

因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以最决绝的态度，将这一被统治阶级巧妙倒置了数个世纪的历史叙事“翻转”过来。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宣告：真正的否定性力量，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秩序本身；而真正的肯定性叙事，唯有解放！

当我们去审视那被资产阶级高歌的“公平、民主、正义”时，我们会发现，它们才是真正具有“否定性”的病毒。因为它们的实质，是在系统性地否定、阉割、阻碍劳动者自身能动性的发展。

那被圣化的“民主选举”，以程序的形式否定了劳动者直接决定自身生产和劳动力分配的可能，强行用代理人机制将大众排除在真实的决策之外；

那被吹嘘的“等价交换”，以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劳动价值的真正归属（公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将剥削行为圣化为合法的肯定性常态；

那被奉为圭臬的“道德正义”，则在思想上否定了劳动者进行彻底革命的合法性，强迫被压迫者在内心中完成自我驯化。

这些概念在实质上是充满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它们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否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否定了绝大多数劳动者过上自由全面发展生活的可能。它们的存在，如同给一个正在成长的巨人套上了金箍，用虚幻的秩序美景窒息着社会生产力的自我确证。

相反，无产阶级所追求的解放，才是对人类命运最伟大的、绝对的肯定。我们对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国家暴力的砸碎（否定），不是因为我们热爱毁灭，而是因为不把这些压迫性的外壳剥离，人类劳动的创造性力量就无法得到全幅度的释放。正如种子的破壳而出，是对土地和阳光的肯定；婴儿的脱离母腹，是对独立生命的肯定；无产阶级对阶级社会牢笼的炸毁，则是对一个不再有剥削、不再有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的全新社会的、最无畏的肯定。

我们要做的，不是在统治阶级定义好的“肯定/否定”游戏中按部就班地答题。我们必须以最冷酷、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砸烂这块意识形态的哈哈镜。我们要让劳动者明白，他们从来不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而是“新世界的绝对建构者”。

当解放被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为其原本应有的肯定性叙事时，它将不再是群众眼中战栗而危险的符号，而是会化作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指引着劳动阶级越过公平、民主与正义的重重谎言，直接走向夺回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实际掌控能力的光明战场。在这个地基之上，无产阶级将不再乞求施舍，而是开始真正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绝对肯定的未来。

第三章：关于两种民主的双重扬弃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在本书的开篇即旗帜鲜明地将民主——这一本身并不属于道德与法的范畴——与公平和正义等并置进行着无情的批判。这绝非是我们理论上的粗心或分类的谬误，而是因为统治阶级精心编织的意识形态罗网中，民主确实是各种幻象中最隐蔽，也是最难被彻底清理的残余。它披着“程序”与“权利”

的外衣，以最无害的姿态，潜伏在被统治阶级的日常政治直觉中。因此，要彻底砸碎这重思想牢笼，我们首先必须冷酷地追问：民主究竟是什么？它又缘何在历史的地表上登场？

当我们剥开词源学的表层，古希腊语中的民主（δημοκρατία）无非是“δῆμος（人民）”与“κράτος（统治）”的拼合，字面含义即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历史中关于民主的一切血腥分歧，其核心从来不在于“人民统治”这四个字，而在于：究竟谁被界定为“人民”？这种统治又以何种方式落地？以及最致命的——这种政治权力究竟依附于何种经济基础？

在通用的政治学叙事中，民主被巧妙地折叠成了三层结构。在大众最直观的感知里，它是程序层面的少数服从多数、选举表决与议事规则；在法权体系中，它是以法治划定公民参政、防范公权力越界的权利框架；但唯有走到实质层面，我们才能触及权力的真实归属与利益的分配格局。程序与权利，不过是实现实质民主的工具。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中，民主的首要属性被无情地揭示为：它是阶级社会里的国家制度形态。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超阶级的、抽象永恒的“纯粹民主”【6】。只要民主还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存在，它就必然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而对被统治阶级实施赤裸裸的专政。

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极其关键的洞察，以此来解释民主的真实起源。民主，在本质上，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得以让自己的“公平与正义”不会落入纯粹乌托邦的一种政治途径的下沉。前文已经论述，公平与正义是统治阶级为了掩盖结构性压迫而炮制的虚假图景，但如果这种图景永远悬在空中，被统治阶级终会因为绝望而掀翻棋盘。于是，民主作为一种精妙的制度装置出现了。通过民主的程序下沉，统治阶级让被统治者产生了一种极其真实的错觉：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选票、通过议会、通过合法的抗争，依靠统治阶级并妥协于统治阶级，从而在现有的框架内一步步实现对公平正义这一美好图景的追求。民主，就是统治阶级给被压迫者发放的一张“可以兑现公平正义”的空头支票，它巧妙地将阶级矛盾的火药，转化为议会里无害的唾沫。

从历史的生成脉络来看，原生形态的古希腊城邦直接民主，不过是建立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适配于小国寡民地理规模的有限权力博弈，奴隶、妇女与外邦人被彻底排除在外。随着城邦的解体，这种极易滑向民粹化治理的古典民主便陷入了漫长的蛰伏，在中世纪的大一统与封建领主制下碎裂为城市自治与等级议会的残存萌芽。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势崛起，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封建专制、争夺政权，才重新举起了启蒙运动“主权在民”的旗帜。他们以代议制（间接民主）解决了大国无法实行直接民主的技术难题，并通过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搭建起了现代宪政框架。

这种被现代人奉为圭臬的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它在形式上允诺全民普选与权利平等，但在实质上，正如马克思所断言，它不过是资本主导下少数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与之相对的，是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登上历史舞台而诞生的新型分支——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从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到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将民主的主体史无前例地扩展至绝大多数劳动者，形成了与资产阶级代议制并行的更高历史类型的民主体系。

然而，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范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并未简单地停留在“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的线性逻辑上。相反，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三位

导师，在面对民主这一沉重的历史遗产时，展开了一场极其深邃的“双重扬弃”——既批判式地扬弃资产阶级民主，又辩证审视并自我扬弃无产阶级民主本身。他们层层递进的思想演进，向我们展现了面对这一国家形态时最为清醒的复杂态度。

马克思为这种双重扬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底。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采取了“保留合理形式，否定经济根基与阶级本质”的批判式扬弃。马克思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确立普选与法治的历史进步性，因为这完成了“政治解放”的任务；议会制与选举制作为程序工具，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制度价值。但他深刻地批判了这种民主的内在异化：私有制决定了这种民主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7】。列宁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资本实质上掌控了选举与立法的全部权力，所谓的普选，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来镇压人民和压迫人民”

【8】。抽象的自由民主口号，成为了掩盖阶级剥削的完美遮羞布。因此，无产阶级绝不能简单照搬这套制度，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民主同样抱有“建构性肯定”与“阶段性扬弃”的复杂立场。一方面，他热情讴歌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民主的雏形，肯定其议行合一、公职人员随时罢免的制度跃迁，认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但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始终保持着绝对的清醒：无产阶级民主依然是过渡性的国家形态，只要它还叫作国家，就带有阶级统治的强制属性，它就绝不是人类终极的治理模式。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使命，是利用民主制度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差别；而当阶级彻底消亡后，作为国家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必将走向“自我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自由人联合体的自治秩序。马克思拒绝把民主当作终极信仰，始终将其锁死在唯物史观的历史链条中。【9】

列宁则将这种理论扬弃重重地砸向了现实政权的粗糙地面，在理想设计与现实约束的剧烈摩擦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民主的辩证认知。列宁彻底继承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他毫不留情地戳穿了考茨基关于“纯粹民主”的神话，直言资本主义民主永远是富人的民主，法律条文的平等根本无法填补财产不平等带来的参政鸿沟。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议会进行合法斗争，但绝不能幻想依靠议会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10】

在夺取政权后，列宁经历了对无产阶级民主从理论建构到现实收缩、再到晚年反思的三重裂变。在《国家与革命》的理想篇章中，列宁完全承接了马克思的构想，试图建立一个全体劳动者直接管理国家、最大限度消灭官僚阶层的最高类型民主【11】。然而，内战的炮火、经济的崩溃与工农文化水平的落后，迫使列宁做出了极其痛苦的“战时被动扬弃”。直接民主无法落地，只能转向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间接治理；战时状态压缩了常规民主程序，高度强化了民主集中制下的权力集中。列宁清醒地知道，这是生存条件下的临时让步，是现实对理想的残酷修正。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列宁敏锐察觉到了苏维埃体制滋生官僚主义的风险，他晚年的最后思考，几乎全部倾注于如何完善工农监察、扩大党内民主、提升全民文化素养以夯实民主基础。列宁深刻意识到，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绝不等于民主的自然落地，必须持续完善监督机制以防止人民民主的异化，这是对无产阶级民主自我扬弃的最真实的实践版本【12】。

当这一历史重任交接到毛泽东手中时，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完成了宏大的中国化。毛泽东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完成了对两类民主的本土化扬弃。他坚决否定了旧式资产阶级宪政在中国道路上的可行性，拒绝照搬西方的竞争性选举与三权分立，却吸收了主权在民、权利保障等通用价值内核，将其改造为适配中国国情的治理工具。

在对中国形态的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的建构中，毛泽东展现出了极具张力的复杂态度。他定型了“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的核心制度，并在“窑洞对”中将民主视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路径【13】。但他同时以矛盾学说严格划定了民主的适用边界：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民主”来解决，他明确反对照搬西方街头闹事式的“大民主”【14】。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当毛泽东察觉到常规制度监督力度不足、党内官僚化倾向抬头时，他又试图创设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作为自下而上监督的补充形式，试图以此捍卫人民主权。这种在“制度常态”与“群众监督模式”之间的来回拉扯与实践反思，最终在历史层面证明了：脱离法治与秩序约束的运动化大民主，并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毛泽东的终极认知是辩证的：人民民主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民主建设受制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能脱离现实条件空谈抽象民主。

行文至此，关于民主的历史推演与理论扬弃已然清晰。基于上述的一切剖析，我们在本书中必须抛出一个更为彻底、更为明确的论断：

民主，不论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民主，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在根本上是要绕开并消解民主这个议题的。

为什么？因为民主——哪怕是无产阶级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它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必然面临两个极端的撕扯：要么滑向少数精英的专断与官僚化，要么走向民粹式的狂热与失控。这并不是哪一种特定的“民主模式”出了问题，而是民主这种“形式本身”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困境。只要你还在讨论“谁说了算”、“票怎么投”、“如何让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你就依然在国家机器的泥潭里打转，你就依然没有跳出“统治与被统治”的旧有逻辑。

有人会立刻反驳：既然资产阶级民主是虚假的，那我们就要去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用真正的民主取代虚幻的民主。

我们承认，无产阶级民主在漫长的过渡时期是绝对必要的。但请注意我们的核心定性——它是“途径”，而不是“阶段性存在”。

这两者有着生死攸关的区别。如果将其视为“阶段性存在”，就意味着它是我们要去建设、去巩固、去当作神像般供奉的东西。仿佛一旦实现了无产阶级民主，我们就取得了某种值得万世庆贺的终极胜利，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维持好、发展好。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且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旦你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渡河的竹筏当成了彼岸的宫殿，无产阶级民主就会开始自身的异化，官僚主义就会在“民主”的保护伞下滋生，最终变成一种新的压迫形式。

说它是“途径”，则意味着它仅仅是一个斗争的工具，是劳动者在夺回对劳动力掌控的过程中，为了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组织社会化大生产而不得不由的一条泥泞之路。我们在踏上这条路的第一天起，就必须保持绝对的清醒：它不是家，不是归宿，它是要在未来的历史中被彻底革除的对象。我们在使用它的同时，就应当且必须在为消灭它创造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民主只能被当作一个必须被否定、必须被辩证扬弃的临时性手段，而不是一首值得永远高唱的赞歌。

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的是什么？是一种排除了“民主”这个伪命题之后的自主与自觉。在那里，不再需要争论“谁来代表我”，不再需要纠结“多数如何统治少数”，因为根本不再需要“统治”这个阶级社会的残余概念。解放的真义，恰恰在于权力的消亡。

但这又引出了最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命题：这种自主自觉，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更不可能仅仅依靠几页精美的宪法草案或凭空产生的制度构想来落地。

制度本身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从来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没有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任何关于“自主自觉”的制度构想都只能是沙滩上的城堡。为什么过去一切关于民主的讨论——哪怕是最高形态的无产阶级民主——最终都难以完全走出“统治-被统治”的循环？根本原因不在于先哲们的制度设计不够精妙，而在于物质条件尚未成熟。

当生产力还不足以让社会成员普遍摆脱生存的重压；当信息的传递还必须依赖层层官僚代理；当社会协作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个体直接参与和运算的能力时——在这些冰冷的物质条件约束下，“谁来代表”、“谁来决策”的问题就必然存在。于是，民主——不管它戴着什么颜色的帽子——就必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强制性议题。

因此，我们要真正绕开民主、扬弃民主，靠的绝对不是在政治文件上宣布废止它，而是在物质基础上彻底瓦解它存在的必要性。

当今科技的爆炸式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网络化生产的崛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某些原本属于乌托邦的设想成为了客观可能：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实现直接的、去中介化的信息互通与大规模协作；整个生产过程可以实现全链条的透明化和可追溯化；社会需求与供给之间可以通过算法实现非市场化的精准匹配。请注意，这些技术进步带来的并不是“更完善的民主”，而是在物理与技术层面，直接消解了“需要有人来代表我做决定”这件事情本身。

生产力的发展同样构成了扬弃民主的决定性力量。当自动化消灭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当劳动时间被极大缩短，当生存不再以出卖劳动力为绝对前提，当个体的发展真正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时——那种需要依靠政治权力来分配稀缺资源、协调利益冲突的“决策政治”，才会从根本上丧失它的施展对象。

所以，我们所期盼的“自主自觉”，从来都不是制度设计出来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在社会形态上的必然映射。制度的作用，绝不是凭空创造出一个没有统治的神话，而是为已经被生产力推动着生成的自主自觉，去清理旧有的障碍、打开广阔的空间。

这也无情地向我们昭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真理：在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民主这个“途径”究竟要存续多久？它的被扬弃速度有多快？这绝不取决于革命者的主观意愿，也不取决于道德口号的响亮程度，而是严酷地取决于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条件与实践环境的成熟程度。

我们不是在祈祷一个政治奇迹的降临，而是在为一个可以被真实创造出来的未来，扫清一切关于公平、正义与民主的思想迷雾。

第四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红线——解放

在经历了前三章对于资本逻辑、劳动力演变以及资本统治边界的严密批判与辨析之后，我们已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台上明晰了一个在阶级社会中被长期遮蔽的历史真相：公平、民主和正义，从来都不应，也绝不能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标准。在漫长的人类阶级史中，它们并非超脱于历史之上的普世价值，而是由阶级社会中无法根除的压迫、剥削、特权和非正义所滋生出来的相反叙事。当奴隶向奴隶主祈求公平，当无产者向资本家呼唤正义时，他们实质上是在承认剥削规则的前提下，乞求一种更为温和的生存境遇。因此，只有“解放”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绝对尺度。公平、民主与正义，说到底，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安抚

与拉拢群众、掩盖剥削实质而生产出的一种虚假命题。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本质，绝不是去追求这种世俗意义上的、修补性的公平、民主与正义。它们不仅要跳出这样的道德叙事，更要在制度设计与历史实践中彻底排除这些概念。社会主义追求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目标，那便是人的全面解放。也正因如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绝不会以追求公平、正义等道德标准为根本目的，它要求在发展过程中从根源上绕开这些伪命题——因为在真正的解放面前，所谓的“不公平”、“不民主”、“不正义”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根本无法再发挥任何社会构造的作用。

长久以来，存在着一种极为普遍且根深蒂固的误解：很多人误以为社会主义是来“主持公道”的，是来追求更完美的公平、更广泛的民主与更绝对的正义的。这种认知不仅错了，而且错得相当离谱。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是为了主持公道，那么它就沦为了资本主义的改良派，沦为了私有制法则下的“青天大老爷”。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绝不能将公平、民主和正义作为衡量的标准，甚至它应当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系统性地拒绝这种概念。因为“公平与正义”恰恰是阶级社会的专制产物，是弱者在面临结构性压迫时，不得不去迷信的一种虚幻性诉求。这种诉求最为可悲之处在于，关于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的最终解释权，永远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当我们煞有介事地在现有框架内讨论公平正义的时候，便已经在无形中承认了私有制法则与雇佣劳动体系的合法性，承认了劳动力可以作为商品被明码标价的合理性。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热衷于讨论如何让剥削变得更公平，如何让压迫变得更民主，或者如何让资本的掠夺显得更加正义。我们只讨论一件事，同时这件事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唯一尺度、唯一语言——解放。

具体而言，解放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哲学口号。我们将视线聚焦于一个最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如何夺回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听起来更加正义、更加公平或更加民主；之所以必须走这一步，仅仅是因为它能够用暴力的手段砸碎旧机器，从而使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去夺回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同样地，确立公有制这一政治与经济前提，也绝不是因为它比私有制更加人道、更加高尚，仅仅是因为它是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进一步解放，开辟了不可或缺的生产关系前提。无论是进行革命、建立专政，还是推行公有制，这些都绝不是简单地为无产阶级搭建一个更加美好、更加舒适的温室乐园，而是为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终极斗争开辟新的道路，激荡出更加激烈的、直指劳动力本质的战场。

这一逻辑，正是我们在前序作品，特别是《资本的当代升维》【15】及《计划与市场之争的终结》【16】等书中反复论证与强调的核心要义：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呈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与建立公有制；而第二阶段的社会革命，其最核心的历史使命，正是夺回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彻底斩断劳动力要素化、格式化的枷锁。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绝不能以所谓的“更公平、更正义、更民主”为衡量指标，它只能以“如何更有利于劳动者与人民群众的解放”、“如何更有利于劳动者夺回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为唯一金标准。它必须从制度的底层逻辑确立劳动者不断夺回自身主权的合法性，并且在制度层面为这种漫长而艰巨的解放斗争，提供持续的、不断自我革新的保障。

这种以“解放”为唯一尺度的制度设计红线，实际上也为我们在第三章中作出的

那个关键论断——“无产阶级民主作为不断被否定的手段，而非阶段性存在”——提供了更加清晰、更具穿透力的注脚。如何区分一种制度究竟是在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在向官僚资本主义退化？本质上就看，这一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机制，究竟是在不断扩展劳动者自身的主权、不断削弱并解构这一制度本身所附着的强权，还是在不断巩固这一制度的壁垒，从而始终不愿意扩展劳动者作为个体的实际权利。

当然，面对这种对民主的扬弃，有人可能会提出一种基于现实的疑虑与强调：人类社会是群居的，公共事务归根结底仍然需要被公共决断，因此某种形式的“民主”必然会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永久存在。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必须给予严厉的理论清算：我们承认公共决断在当下的必然性，承认这一情况的过渡性，但我们绝不承认它作为一种永恒形态的存在性。严格地讲，未来的社会发展必然会不可逆转地呈现出一种生产力与劳动力形态的深层裂变：劳动者作为个体的某种核心能力，将越来越呈现出高度的特异性与不可通约性。

正如我们在《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一书中所明确指出的，这种不可通约的能力正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它的特异性、随机性、不可预测性与非标准化，决定了它拒绝被任何世俗的尺度去衡量与折算【17】。而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工具（特别是人工智能与高度自动化的机械）的突飞猛进，人类所要面临的、需要处理的常规公共事物与物质生产，将越来越容易被量化、被通约、被机器代劳。

在这样一种个体意识高度不可通约，而公共事物高度可通约的历史条件下，公共事务的运作逻辑将发生根本性的重构。未来的社会机制中，公共事务将不再如当下政治体所面临的那样，仅仅表现为一种必须依靠投票、表决与权力强制来维系的“混沌的整体性”。相反，它能够被更加清晰地解读为“个体的关联性与宏观的整体性”的辩证统一体。在摒除了异化劳动的生存压迫后，劳动者不再是被裹挟在集体中的盲目原子。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自主、自觉地依赖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关联性，圆满地处理好个体事物、释放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独特创造，其本身便构成了对宏观整体性事物的最大负责。这便是在实践层面上对传统“民主”概念的彻底扬弃与取代。民主——这个建立在个体利益博弈与多数决暴政基础上的历史范畴——将随着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的消解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个体的自觉联合。

归根结底，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就是一场以“解放”为绝对红线的浩大工程。它不屑于在旧制度的废墟上搭建一个名为“公平”的避难所，而是要彻底摧毁制造不公的剥削机器与要素化枷锁。当劳动者真正夺回了自身劳动力的主权，当不可通约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成为驱动社会实践的主导力量时，我们便不再需要用公平去控诉不公，不再需要用民主去制衡专制，不再需要用正义去丈量罪恶。因为公平与正义的呼声，永远只停留在人类处于必然王国的史前史；而唯有彻底的解放，才是人类真正开启自身历史的磅礴序章。

引用

- [1]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178.
- [2]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304-305.
- [3]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152, 222.
- [4]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04: 204.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04: 874.
- [6] 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M]//列宁选集:第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600-601.
- [7]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42-43.
- [8] 列宁. 国家与革命[M]//列宁选集:第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209.
- [9] 列宁. 国家与革命[M]//列宁选集:第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221-223.
- [10] 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M]//列宁选集:第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612-614.
- [11] 列宁. 国家与革命[M]//列宁选集:第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215-217.
- [12] 列宁.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M]//列宁选集:第4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780-782.
- [13]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M]//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5-1476.
- [14]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M]//毛泽东文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208-209.

[15] 张皓翔. 资本的当代升维[EB/OL]. 预印本. 日内瓦: Zenodo, 2026. 链接: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244088>

[16] 张皓翔. 计划还是市场? 夺回! ——计划与市场之争的终结[EB/OL]. 预印本. 日内瓦: Zenodo, 2026. 链接: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473889>

[17] 张皓翔. 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EB/OL]. 预印本. 日内瓦: Zenodo, 2026. 链接: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17028>